



Global Europe, Social Europe

欧洲模式

全球欧洲，社会欧洲

[英] 安东尼·吉登斯 帕德里克·戴蒙德 罗杰·里德/主编 沈晓雷/译

Edited by Anthony Giddens, Patrick Diamond and Roger Liddl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Global Europe, Social Europe

欧洲模式

全球欧洲，社会欧洲

[英] 安东尼·吉登斯 帕德里克·戴蒙德 罗杰·里德/主编 沈晓雷/译
Edited by Anthony Giddens, Patrick Diamond and Roger Liddl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洲模式: 全球欧洲, 社会欧洲 / (英) 吉登斯 (Giddens, A.), (英) 戴蒙德 (Diamond, P.), (英) 里德 (Liddle, R.) 主编; 沈晓雷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11

(欧洲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ISBN 978 - 7 - 5097 - 1688 - 5

I. ①欧… II. ①吉…②戴…③里…④沈… III. ①社会发展 - 欧洲 - 国际学术会议 - 文集 IV. ①D750.6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7935 号

欧洲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欧洲模式

——全球欧洲, 社会欧洲

主 编 / [英] 安东尼·吉登斯 帕德里克·戴蒙德 罗杰·里德
译 者 / 沈晓雷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139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负责人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宋浩敏 杜 峰
责任校对 / 单远举
责任印制 / 董 然 蔡 静 米 扬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7.25
字 数 / 296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688 - 5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08 - 2070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政策网络

本书是 2005 ~ 2006 年，由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帕德里克·戴蒙德（Patrick Diamond）和罗杰·里德（Roger Liddle）领导，由弗朗索瓦·拉方德（François Lafond）管理的大型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工程对欧洲社会模式进行研究的结果。它源于政策网络在 2006 年 3 月出版的一本名为《汉普顿宫议程：欧洲的社会模式》的政策小册子。

政策网络是纽约、佛罗伦萨和柏林进步治理峰会之后，于 2000 年 12 月在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意大利总理朱利亚诺·阿马托和瑞典首相约兰·佩尔松的支持下建立的国际智库。2003 年 7 月，政策网络组织召开了伦敦进步治理大会，共有 12 国领导人，超过 600 名进步政治家、思想家和战略家应邀与会。2004 年 10 月，以上次大会的成功为契机，政策网络组织召开了布达佩斯进步治理大会，由匈牙利总理久尔查尼·费兰茨担任东道主。2005 年 7 月，政策网络与南非非洲研究中心和南非总统府在约翰内斯堡共同组织召开了第一届非洲地区进步治理大会。2006 年 2 月 11 ~ 12 日，政策网络在南非的哈曼斯克雷举办了进步治理峰会。

进步网络

政策网络的目标是在中左现代化主义者中间促进和推广进步政策理念。

作为进步治理网络的秘书机构，政策网络极力促进欧洲各国及世界其他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决策者和专家在相互之间开展对话。通过提供一个促进争论和交流思想的平台，政策网络加强了现代化主义者和不断创新的力量。

我们共同的挑战

欧洲的进步政府与政党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都在寻找现代社会民主的反应。人们越来越对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以及改革传统福利国家的就业政策所遇到的矛盾，科学与技术领域的急剧变化和迫在眉睫的全球性问题感到担忧，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作为基本民主重建的一部分来加以解决。过去，进步论者通常独立地解决这些问题。现在，我们日渐认识到必须以我们的社会民主价值观为基础，与其他国家的进步论者进行合作，将欧洲各国的反应纳入进步思想的更为广阔的国际架构之下。

行 动

通过一系列定期举行的活动，尤其是每年的春季营会和每 18 个月一次的进步治理大会与峰会，政策网络已经具有了很强的生命力。除此之外，我们还就特定的政策问题组织了一系列专题讨论会、工作小组会和一日会。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经济改革、公共服务、民主重建、社群与不平等，以及全球治理等。

2005 ~ 2006 年，我们将重点放在了欧洲社会模式的重建上面。我们从事这一欧洲社会模式的项目正值英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期间，我们对欧洲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应该主要采取哪些措施才能应对 21 世纪的挑战进行了调查。汉普顿宫欧洲峰会召开一周前，英国首相在唐宁街 10 号召集了一次私人研讨会，共有 15 篇工作文件被提交给会议讨论。此后，我们又于 2005 年 11 月底就这一项目召开了一次有影响的研讨会，并在接下来的 2006 年上半年，与意大利、荷兰、法国、匈牙利、德国、西班牙和芬兰的其他欧洲中左智库合作，在整个欧洲召开了一系列研讨会。我们在英国各地也举办了一系列类似研讨会。

自 2000 年建立以来，政策网络一直致力于为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中左政府的新的政策议程提供帮助。这些会议既在伦敦举行，也与意大利欧洲基

金会、荷兰贝克曼基金会、全球进步论坛、西班牙替代基金、欧洲左翼基金、德国艾伯特基金会、进步政策研究所和美国进步中心等智库合作，在欧洲其他地区举行。

这些研讨会的成果被汇编进了三期政策网络的杂志《进步政治》的年报及一些小册子之中，它们在网上四处可见，被放到了我们的官方网站，并被用来作为政策网络所举办的研讨会的基础。

我们为自己在政策创新领域所开创的这项事业感到自豪，这项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我们所建立的国际伙伴网络的大力帮助。

名誉主席：彼得·曼德尔森 (Peter Mandelson)

主任：帕德里克·戴蒙德 (Patrick Diamond)

行政助理：苏姗·维本尼-布伦南 (Suzanne Verberne-Brennan)

办公室主任：安娜·布勒盖斯 (Anna Bullegas)

项目经理：乔安妮·伯顿 (Joanne Burton)

首席出版与研究员：纳萨尼尔·科普塞 (Nathaniel Copsey)

研究主任：奥拉夫·格雷姆 (Olaf Cramme)

政策研究员：乔安娜·尤塞柳斯 (Johanna Juselius)、

西蒙·拉森 (Simmon Latham)、

罗伯特·劳伦斯 (Robert Lorentz)、

康斯坦斯·莫特 (Constance Motte)、

安德拉斯·纳吉 (Andrús Nagy)

[www. policy-network. net](http://www.policy-network.net)

作者简介



卡尔·艾金格 (Karl Aiginger)，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所长。他的近作包括：《大欧洲的竞争力及其对大西洋两岸关系的影响》，这是为以美欧经济比较为主题的第二届伯克利—维也纳年会（2005年12~13日）准备的论文；《劳动力市场改革与经济增长：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验》，载《经济研究杂志》。

卡廷卡·巴利斯克 (Katinka Barysch)，伦敦欧洲改革中心的首席经济学家。此前她曾在经济学人信息部工作。最近她在欧洲改革中心发表的文章包括：《欧洲为何应该拥抱土耳其》[与史蒂芬·埃维茨 (Steven Everts) 和希瑟·格拉贝 (Heather Grabbe) 合写，2005年]；《与龙共舞：欧盟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与查尔斯·格兰特 (Charles Grant) 和马克·伦纳德 (Mark Leonard) 合写，2005年]；《欧盟与俄罗斯：战略伙伴还是争吵的邻居?》(2004年)。

西蒙·卡曼德 (Simon Commander)，伦敦商学院新兴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高级顾问。此前他曾在华盛顿特区的世界银行工作。他的著作颇丰，包括图书、论文和工作文件等。

瑞尼·卡普鲁斯 (René Cuperus)，荷兰工党下属智库贝克曼基金会主管国际关系的高级研究员。他的近作包括：《为何荷兰投反对票：老欧洲的新欧洲怀疑主义之剖析》(2005年)；《多元化的挑战：移民、一体化与多元文化浪潮中的欧洲社会民主》[与K. 杜飞克 (K. Duffek) 和J. 坎德尔 (J. Kandel) 共同主编，2003年]；《欧洲与国家认同的复仇》，载《欧洲，全球角逐?》(2006年)。

帕德里克·戴蒙德 (Patrick Diamond)，政策网络主任，曾担任英国首

相政策研究室的特别顾问。他在2005年作为跨大西洋事务研究员参加了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他还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治理中心的高级访问学者。

马瑞奇奥·费雷拉 (Maurizio Ferrera)，米兰国立大学社会与劳动力市场政策专业教授、阿尔贝托基金会（都灵）欧洲治理研究所所长，米兰博科尼大学 POLEIS 比较政治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他的著作作为《福利的边界：欧洲一体化与社会保障的新空间政治学》（2005年）。

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院长。他目前是剑桥国王学院的终身院士和英国国会上院的议员。

阿洛伊斯·古格 (Alois Guger)，维亚纳奥地利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涵盖收入分配、收入与工资政策、劳资关系和就业与稳定等。他的近作（英文）包括：《欧洲社会模式：从障碍到优势》（2005年）；《停滞政策与增长政策》[与 M. 马特鲍尔 (M. Marterbauer) 和 E. 沃尔特斯肯森 (E. Walterskirchen) 合写，2006年]；《适应能力：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与欧洲大陆模式为何会存在差异》（与 K. 艾金格合写，2006年）。

阿克塞尔·海特穆勒 (Axel Heitmueller)，英国内阁办公室战略小组的经济与政策顾问。他还是伦敦商学院新兴市场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员。他的作品主要发表在《人口经济学》和《苏格兰政治经济学杂志》等杂志上面。

安东·海梅利赖克 (Anton Hemerijck)，海牙荷兰政府政策科学委员会主任，莱顿大学公共管理系的高级讲师。

珍·简森 (Jane Jenson)，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政治学院公民与治理首席研究员。她与 M. 斯纽 (M. Sineau) 合著了《谁在意？女性就业、儿童保育和福利国家再设计》（2001年）。

罗杰·里德 (Roger Liddle)，现为欧盟委员会欧洲政策顾问局的主席团成员，曾在欧盟贸易委员彼得·曼德尔森 (Peter Mandelson) 的办公室任职。他曾担任托尼·布莱尔的欧洲顾问达8年之久。他还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欧洲研究所的访问学者。他的著作包括：《布莱尔革命：新工党能否完成》（与彼得·曼德尔森合著，1996年）；《欧洲新景观》（2005年）；《欧洲经济改革：未来五年的重中之重》[与玛丽亚·若昂·罗德里格斯 (Maria Joao Rodrigues) 合著，2005年]。

曼斯·朗诺斯 (Måns Lönnroth)，瑞典战略环境研究基金会 (Mistra) 总理事、瑞典环境部前国务秘书。他还是瑞典政府环境问题咨询委员会及其他组织机构的成员。他从1999年开始就成为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

会这一中国政府顾问委员会的成员。2002年，他被任命为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副主席。

罗克·苏特 (Luc Soete)，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马斯特里赫特创新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他主要对技术变迁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新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对就业、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影响进行广泛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约翰·萨顿 (John Sutto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约翰·希克斯经济学教授，主持三得利丰田经济学及相关学科研究中心与产业集团有关的经济学研究。他的著作包括：《沉没成本与市场结构》(1981年)；《技术与市场结构》(1998年)；《马歇尔的倾向：经济学家可以了解什么》(2000年)。

卢卡斯·蒂斯卡里斯 (Loukas Tsoukalis)，雅典大学欧洲一体化教授、巴黎政治学院和布鲁日欧洲学院的客座教授。他还是希腊欧洲与外交政策基金会主席，欧盟委员会主席的特别顾问。他的著作有：《什么样的欧洲?》(2005年)。

劳拉·泰森 (Laura Tyson)，伦敦商学院院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前院长。1993~1995年间，她在克林顿政府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95~1996年，担任总统国家经济顾问。她的著作与论文主要涉及产业竞争力与贸易，中欧经济及其向市场体系的过渡。泰森博士还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经济研究所、布鲁盖尔中心、伊士曼柯达公司、摩根士丹利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帕特里克·威尔 (Patrick Weil)，巴黎第一大学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他的近作包括：《何谓法国人？大革命以来的法兰西民族史》(2002年)；《共和国及其多样性》(2005年)。



感谢信

本书的各个章节是在英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期间，政策网络的工作小组以“欧洲社会模式”为主题，于2005年6~12月组织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的产物。这一系列会议共举办了四次，举办地分别为罗马、阿姆斯特丹、伦敦和布达佩斯。我们三人共同主持了这些研讨会——与会者主要为欧盟和欧洲各国的高级决策者和专家，在此我们谨向所有与会者表示感谢。这些研讨会为讨论和分享政策理念，比较欧洲各国社会模式改革的新战略提供了难得机会。我们要特别感谢各位作者和与会者的支持与帮助。

我们还要感谢那些在此书出版过程中提供帮助的人。政策网络办公室的马修·布朗（Matthew Browne）和弗朗索瓦·拉方德一直在马不停蹄地组织这些会议，联络作者，编辑初稿和协调本书出版。如果没有他们的献身精神和职业素养，本书将很难与读者见面。还有乔安妮·伯顿和乔安娜·尤塞柳斯，他们一直在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个项目。让-弗朗索瓦·多列特（Jean-François Drolet）为我们提供了卓越的研究协助，并在编辑和校正本书的过程中给予了我们莫大的帮助。维克多·菲利普·达戴尔（Victor Philip Dadaleh）帮助我们设计了这一项目，并给予了我们宝贵的帮助与建议。安妮·德·塞拉（Anne de Sayrah）一直以来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后，我们还要感谢艾玛·哈金森（Emma Hutchinson）及所有政治出版社的同仁，感谢他们自始至终的高效与帮助。

安东尼·吉登斯 帕德里克·戴蒙德 罗杰·里德

目 录

关于政策网络	001
作者简介	004
感谢信	007
引言	安东尼·吉登斯 帕德里克·戴蒙德 罗杰·里德 / 001
第一章 欧洲的社会模式?	安东尼·吉登斯 / 012
第二章 全球化: 欧洲视角	约翰·萨顿 / 033
第三章 东欧 vs 西欧? 欧盟扩大后的经济与社会模式	卡廷卡·巴利斯克 / 046
第四章 移民工人与就业: 对欧洲社会模式的挑战?	西蒙·卡曼德 阿克塞尔·海特穆勒 劳拉·泰森 / 062
第五章 欧洲项目的脆弱性	瑞尼·卡普鲁斯 / 081
第六章 社会变迁与福利改革	安东·海梅利赖克 / 094
第七章 欧洲社会经济模式	卡尔·艾金格 阿洛伊斯·古格 / 110
第八章 欧洲社会模式: 性别与代际平等	珍·简森 / 131
第九章 社会公正之重新解释: 欧洲福利国家的新边界	帕德里克·戴蒙德 / 149
第十章 知识经济: 范式及后果	罗克·苏特 / 169

第十一章	欧洲社会模式的环境问题	曼斯·朗诺斯 / 188
第十二章	移民：多元欧洲的弹性架构	帕特里克·威尔 / 201
第十三章	经济改革、一体化深化与进一步扩大：欧盟能够实现吗？	卢卡斯·蒂斯卡里斯 / 215
第十四章	朋友而非敌人：欧洲一体化与全民福利国家	马瑞奇奥·费雷拉 / 227
第十五章	欧洲共同社会公正政策	罗杰·里德 / 246

引言

安东尼·吉登斯 帕德里克·戴蒙德 罗杰·里德

本书主张将社会公正的诉求置于经过改革,能够应对 21 世纪挑战的欧盟的核心。建立一套新的促进社会公正的政策是解开欧洲需要进行但至今发现很难成功的改革的钥匙。

有诸多原因可以解释为何“欧洲社会模式”(European Social Model, ESM)必须进行改革。有些原因基本与外部压力无关。比如,它们可能起因于预期寿命的提高及其给养老金和社会关怀带来的影响,抑或妇女生活选择的扩大及其对一人和两人赚钱养家所赚取财富的显著差异带来的影响:这些都是欧洲社会模式自身的成功所带来的问题。其他改革的压力来自全民性制度,尤其是教育和医疗保健制度没有真正实现它们所承诺的机会均等与公平:社会模式的捍卫者总是很难接受这一现实。然而,根本的挑战来自经济方面:由人口问题、出生率下降和全球化挑战而引起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政策圈内,人们已经或多或少将类似观点视为改革的缘由。但在如何改革这一问题上,人们却存在很大分歧。这种改革意味着摒弃通常被批评者视为效率低下,现在终于有机会削弱的社会模式的平等主义和社会保护作用吗?抑或正如我们认为的那样,我们有可能通过改革修改现存的政策并制定新的政策,从而以适合当今世界的方式来实现福利国家的价值观——以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解决结构性不平等为目标?

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除了撒切尔时代的英国之外),社会公正与经济效率在人们眼里一直在携手并进。但欧洲经济状况的恶化导致这一一度确定无疑的事情遭到人们的质疑。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在经济增长低下和存在人口劣势的情况下,现有的社会模式是否能够继续支

撑下去，它还在于不同的社会模式在自身的运转过程中，是否因对市场弹性加以限制而阻碍了经济增长与高就业率的可能。我们必须准备应对如下悖论：捍卫现存的社会模式可能在某些关键领域不利于社会公正，而从表面上看给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公正带来挑战的改革，实际上则可能会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公正的长远利益。

随着全球化和亚洲经济革命所带来的挑战日渐凸显，这一难题变得越发紧急。对于许多欧洲国家而言，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是守势、担忧，甚或多疑。但这种反应过于激烈。从某些方面来说，人们可以将当前的全球化进程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以共同市场为开端的的市场开放进程的最新发展，是欧洲实现单一市场和欧盟扩大的必由之路，能够通过促进创新、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而给欧洲带来巨大的收益。在那些一度深陷贫困泥淖的国家创造大量新的消费市场，不但为欧洲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机遇，而且也表明全球社会公正正在不断取得进步。

然而与此同时，全球化还意味着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经济挑战大幅增加。它使得流动资本得以充分挖掘快速增长的劳动力储备的潜力，这些劳动力储备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城市化劳动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够首次有效地满足全球产业的需求，并在下一代有能力进入最高技能劳动力的行列。

全球化不可能给欧洲社会的所有部门都带来实惠，尤其对于那些最容易遭遇成本效益竞争的部门而言更是如此。如果现代化主义者造成了这些问题的产生，他们就会失去公信力。实际上，不断对我们社会产生影响的全球化力量将会加剧不平等，减少低技术工人和弱势群体的生活机会。这些影响目前已经初见端倪。或许欧洲各国人民比他们的领导人更加本能地把握了这一事实，这也是为何难以在政治上推进改革的原因。我们往往认为全球化在迫使人们适应更加严酷和竞争更加激烈的世界，而非用最新的工具来武装人们（不仅仅是那些拥有自然优势，可以帮助他们在这一新的世界中取得成功的人）去应对这个世界。

评论家经常指责欧洲尤其是欧元区的主要成员国之所以在改革的道路上步履维艰，原因在于欧洲社会模式所固有的保护主义和社团主义，以及改革掌握在既得利益者和“否决者”的手中。我们的观点截然不同。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进，原因在于这些集团能够将自己装扮成普遍利益的守护者，能够防止任何社会权利的流失：事实上他们自身也真诚地相信这一点。改革的拥护者发现很难战胜这些反对者，因为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在社会公正方面为

改革政策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

本书的作者们认为要想具有竞争力，欧洲并不需要采纳新自由主义的正统观念，不过也没有人自欺欺人地宣称自由市场和自由化并非整体改革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共同的目标应该是建立发展型和授权型的福利国家，解决因全球化而加剧的不平等问题，并将我们的人民用知识经济武装起来。

这首先对于欧盟各成员国而言是一个政治挑战。尽管有些成员国的情况要比另外一些好很多，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骄傲自满。而且各成员国在再分配问题上的社会与政治偏好，以及对国家行为、个人责任和自愿行动间相对作用的重视程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人们普遍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欧洲社会模式”。由于欧洲各国的情况存在差异，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不存在欧洲的社会模式。尽管如此，在支撑欧盟各国社会模式的价值理念中，仍然有足够的共性使得对共同问题的讨论贴上了“欧洲社会模式之未来”的标签。除了欧盟15国之外，这一命题同样也适用于新成员国。实际上，绝大多数新成员国并非低税天堂，它们也拥有急需改革、昂贵和设计不当的福利制度。

而且，欧盟各成员国拥有共同的经济与政治空间，相互之间具有很高的依存度。欧洲怀疑论者或许不会在乎这一点，但相互依存的确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各国国情与政治偏好存在差异，本书的作者们仍然支持欧盟要比现在发挥更大作用的原因。尽管各国的福利制度都发展出了自身的动力学，并进而导致了自身独特的问题和改革议程，但它们在将来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人口问题、技术变迁和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具有共通性。最近几年以来，各国在应对这些挑战的方法上也越来越具有趋同性。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应该在共同原则的基础之上对欧洲的社会模式进行重新设计，但同时我们也要给各国发挥自己的政治偏好留下足够的空间。

大多数评论家将改革失败的原因归结到落实层面——政治能力与政治意愿存在问题。然而我们认为，改革的定义与合理性也存在很大问题。即便在那些承认亟须解决“供方议程”的人当中，对“改革”的解释也存在差异。欧洲当前陷入疲软的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在改革的道路上走了弯路。欧盟成员国之所以实行财政紧缩政策，与它们为了在经济增长较慢的情况下负担得起福利制度有关，我们并不赞同这种做法，我们认为应该通过改革和市场自由化来实现更高水平的福利与社会保障。

对于许多政治左派人士而言，为了获得有效多数选票，欧洲的社会与经

济改革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弹性、工资限额政策和降低社会“权利”的委婉说法。这与令人不快的“撒切尔”疗法相结合，使得“改革”被描绘成英国的“新自由主义”议程。尽管我们三个都是英国人，但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改革议程。

英国撒切尔主义改革方案的目标具有片面性，主要局限于某些私有领域和建立服务经济（但工资太低，“高质量”工作太少）。在劳动力市场领域，强势群体受到约束，但弱势群体并未受到保护。在其他领域，撒切尔政府给英国经济造成了积极地损害，削弱了其产业基础（并没有对传统产业与部门进行重组），在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不足。新的欧洲议程肯定不能重复这些失败。

对欧洲未来社会与经济方向的讨论不但与英国，而且也与其他成员国相关。对于我们而言，改革并非英国的，而是欧洲的；并非“新自由主义的”，而是进步的。在欧洲历史的早期阶段——如 20 世纪 70 年代勃兰特时期的联邦德国和奥洛夫·帕尔梅时期的瑞典，改革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更好的福利和更多的养老金，从而也就意味着赋予弱势群体新的社会权利。当前，欧洲的进步现代化主义者需要对改革的特质加以修正，就像我们准备在本书中所做的那样。

在本书第一章中，安东尼·吉登斯对欧洲社会模式的讨论现状进行了概述。他对当前讨论中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考察：将就业放在首位是正确的；并非只有低税收的经济才能在一个竞争日益加剧的世界中实现繁荣；劳动力市场弹性至关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式的“雇用和解雇”；知识经济并非一个空洞的辞藻，教育领域的投资、大学的扩招和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是欧洲社会模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问题也需要被纳入讨论的范畴；老龄化社会应该被视为一个机遇；移民的影响不容忽视；国家的改革与公共服务的分权和多元化在整个欧洲都非常重要。以此为基础，吉登斯拟定了一个改革的样板：从消极福利转为积极福利；强调激励与福利并存，义务与权利并重；新的风险观；重新制定，而非抛弃捐助原则；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纳入“积极福利”的概念之中，重视去官僚化措施。

欧洲社会模式所面临的绝大多数核心困难都不是某一国家特定的现象，它们是结构性的。事实上，福利国家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对公共服务的期望日益增加——都是战后安全的产物，是福利政策本身所催生的结果。但这并不是说全球化没有带来严峻的挑战。

第二章至第六章更加深入地探讨了当前社会模式讨论的内容。约翰·萨顿解析了全球化导致欧洲社会模式难以运转的论点。低工资竞争给欧洲带来的挑战并没有那么大，给欧洲带来巨大挑战的是拥有高生产率与高质量产品的亚洲公司迅速获得的竞争“能力”。它们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低科技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如纺织业和服装业，接下来就将是“中间地带”的部门，如汽车制造业，因为这些部门的高质量标准最容易遭到复制。但欧洲仍然在机床制造等依靠专门技术的产业保有优势。这些企业都拥有内部专业能力，别的企业很难进行复制。它们的优势在于它们能够进行创新和适应新的情况。然而，竞争成功将越来越需要在迅速重新分配资源和开发新产品方面保持弹性。严厉的就业保护法可能会阻碍这一目标的实现。它们对总体就业水平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它们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阻碍了就业破坏与就业创造，从而使欧洲很难对全球化做出应对。对弹性的需求并非意味着以税收为资金来源的福利国家的终结，它只是表明产业政策必须能够培育新企业的能力与弹性，使得它们良性发展。再分配的社会政策必须确保它们不会阻碍就业创造。

卡廷卡·巴利斯克揭穿了波兰管道工，单一税率的幽灵阻碍了社会民主政府的发展前途，以及欧盟 15 国正在向新成员国输出工业工作等流行神话的真相。没有证据表明就业转移正呈大规模之势：就业转移基本是在整体供应链内部进行的，且加强了欧洲企业的整体竞争力。担心税收导致就业从西欧流向东欧也是没有道理的：新成员国的公司税比较低，但整体税收负担并非如此，因为它们的劳动税比较高。将新成员国视为低税天堂的样板是完全错误的：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在劳动力市场闲置和昂贵的福利负担方面的问题，要比老欧盟成员国更为严重。然而，雇主威胁将工作转移到东欧有可能会加强他们控制工资和推动企业重组的力量。而且，当劳动力自由流动在 2011 年完全放开的时候，可能会给那些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的国家带来一些问题。

西蒙·卡曼德、阿克塞尔·海特穆勒和劳拉·泰森主要利用美国研究考察了移民和离岸外包所产生的相关影响。在美国，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移民导致本土工人失去了以前所从事的工作，尽管其对降低工资水平产生一些小的影响。这种对工资的影响涵盖整个职业结构，而非人们所认为的只涉及与移民相关的职业。离岸外包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但它已经从制造业扩展到商业服务，有人认为离岸服务外包平均能够节省 30% 左右的成本。这大大有